



张碧波 著

# 东北古族古国

# 古文化研究

DONGBEIGUZUZUGUGUOGUOWENHUYANJI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

上卷

张碧波 著

# 东北古族古国

# 古文化研究

DONGBEIGUZUGUOGUOWENHUAYANJIU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(上卷) /张碧波著. —哈尔滨: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00.8

ISBN 7-5316-3748-0

I. 东... II. 张... III. 地方史-研究-中国-东北地区-古代 IV. K2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42956 号

**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  
(上 卷)**

DONGBEI GUZUGUGUOGUWENHUA YANJIU

张碧波 著

责任编辑: 张天栋 刘剑刚

封面设计: 孙少江

责任校对: 文 心

---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
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·印张 14.125·字数 340 千

2000 年 8 月第 1 版·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00

---

ISBN 7-5316-3748-0/K·91 定价: 51.00 元 (上、中、下卷)

2000 12.5

王府井书店

No. 0082191

# 绪 论

孟 古 托 力

## 一、爱国主义推动下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两次热潮

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界线弯曲、漫长，现今陆路部分约二万二千公里，故而形成大面积的边缘地带，一般称之为边疆地区。在祖国大家庭里，生活着 56 个兄弟民族，除汉族外，其余均以少数民族相称。大体上是由古代难以数计的部落、部族、民族等共同体演化而来的。历史长河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。于是边疆与少数民族便结成紧密关系。非常明显，北部边疆在我国边疆总面积中占据绝大部分，生活在这里的兄弟民族即北方民族总有半数以上。北方民族与北部边疆的结合，不仅产生独特的人文景观、自然景观，而且创造独具特点、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。于是北部边疆民族史作为一个独立、边缘、交叉学科立足于史坛。

### （一）忧患意识的增长及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

边疆民族史并非滥觞于今人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边疆民族史的优良传统。《禹贡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都有许多这方面的珍贵内容。继之，历代史

书、方志、杂记、诗词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少。边疆民族史早就成为传统文化、传统史学的一个部分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她陆续增加一些独特品格。

17世纪50年代始，沙皇俄国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喀尔喀地区，其后半个世纪中越发肆无忌惮。清朝政府在组织各族人民予以反击的同时，坚持以和谈方式解决争端。1689年签订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中俄东部疆界线。但是沙俄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并未收敛，转而对准西部边疆。18世纪初，多次派兵溯额尔齐斯河、鄂毕河而上，在中国准噶尔地区建要塞、驻军队、赶走边民。同样遭到边疆各族的自卫反击。继之，策动蒙古族领袖策妄阿拉布坦叛国降俄，又遭拒绝。<sup>1</sup>随之，清朝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，经济继续发展，并对边界普遍勘定，为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较多的条件。

一个半世纪之前，资本——帝国主义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中华民族的前门和后门。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我们，割地、赔款、丧失主权……中华民族被凌辱，边疆民族常首当其冲。1858年，沙俄趁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，强迫清政府签订《璦琿条约》，侵割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两年后即1860年，又迫使清政府签订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，割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一般史书均言，沙俄通过这两个条约鲸吞我国东北边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此说似乎定讞。对此，有两点需要指出：其一，这些数字纯属估计，有待认真计算。其二，100万平方公里只是陆疆面积，不包括与此相连的大面积海疆。这片海疆系指今鄂霍次克海、鞑靼海峡和日本海西部。对偌大面积海疆从没测算，连估算也没有，各种论著似乎无问津者。这种现象，正如某家庭遭到强盗抢劫，损失多少，从家长至成员均不清楚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对东北、蒙古、台湾等地怀

着强烈觊觎之心，通过 1894 年甲午战争侵占了台湾、澎湖等；通过 1905 年日俄战争将东北南部作为势力范围。另外，英国对西藏、法国对西南边疆多有染指。

一页页的中国近代史记载这个古老民族的苦难、辛酸，从而激起她的儿女们的自卫心理。其中，一些有为的士子本其良知素养，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忧患意识。他们焦虑国家，关切民族，反思“古今利病，边陲离合，绝域政教”，于是“史学兴焉”，<sup>②</sup>即陆续走上研究边疆民族史，特别是北部边疆民族史的道路。从而在这个古老学科中，张扬起传统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，增加国际政治因素，带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。应当说，这是该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运动。

他们翻阅典籍，实地考察，潜心于这个学科中。研究民族以调整政策，考察舆地以筹措边防，慷慨陈辞以警示朝野，著书立说以陈述己见，积极开拓以了解世界。高声疾呼：“寸寸山河寸寸金”，“国土尺寸不予人”。<sup>③</sup>主要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：张穆（1824～1862），在其丰厚的著述中，用力最勤，享誉最高的当属《蒙古游牧记》。该书打破蒙古史研究中有史无志的局面，填补西北边疆舆地学研究的空白，至今仍是蒙古史研究中必备的参考书。何秋涛（1824～1864），不仅是研究边疆民族史的大师，而且也是中俄关系学、中国俄罗斯学的学者。代表作《朔方备乘》，为当时治理北部边疆民族地区提供必要的史地资料。姚莹（1785～1852），考察过台湾、西藏等海疆、陆疆的著名学者，撰写许多边疆民族文化的著作，如《康輶纪行》、《东槎纪略》、《识小录》、《寸阴丛录》等。在写实中融汇了先进思想。<sup>④</sup>曹廷杰（1850～1926），积极主张抗俄，收复失地、克服重重困难，考察过沙俄占领下的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的许多地区。著有《东北边防辑要》、《西伯利亚东偏纪要》和《东三省舆地图说》

此外，丁谦、洪钧、屠寄、王国维、宋小濂等都是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文人。龚自珍、魏源、沈垚、徐松等著名学者，时间上虽略早一点，但与这一时期边疆民族史研究均有密切关系。这些人如“群星璀璨，交相辉映，极一时之盛。”<sup>⑤</sup>形成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热潮。在当时情况下，他们弃空谈，戒繁考，主张经世致用。用热情的文字表示着深沉的情感，寄托着爱国主义情怀。后人总结其特点有二：开发边疆，维护国家统一；巩固边疆，抵御外侮。<sup>⑥</sup>在中国边疆民族史乃至学术史上写下光辉一页。

## （二）忧患意识继续增长及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二次热潮

20世纪20年代起，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。1911年和1921年沙俄和苏联两次策动外蒙古独立。继之，苏联长期驻军外蒙古。1912年沙俄策动科布多叛乱、呼伦贝尔“独立”。1921年、1933年、1934年、1937年、1938年，苏联军队“五次大规模越境”，进入新疆地区。“除第一次是进剿白俄残军外，其余都是干涉中国内政……扶植亲苏军阀盛世才。”<sup>⑦</sup>同时，在英国殖民主义支持下，西藏分裂势力多次煽动“驱汉”、“独立”活动。更严重的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日本军部积极履践“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”的大陆政策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占领东三省、热河、察哈尔、内蒙古中部和东部。东北、正北和西北部即三北边疆或丧失，或危如累卵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对中国侵略急剧向纵深发展。我国北部边疆不仅失掉抵御外国入侵的屏障之功能，而且被外国占领地区已构成对中国新的威胁。

边疆危机，民族危机，整个中国危机。在险象环生之际，许多中华学子直面社会现实，心系边疆，心系民族，心系祖国。关注世运，攘臂前行，投身到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。这种形势有力地推动当时政府，使其采取某些措施，于是逐渐形成边疆民族史

研究的第二次热潮。

创办许多刊物，成立不少学会是其重要标志。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族青年创《蒙古农民》。发行已久的《东方杂志》不断刊载边疆民族文章。1929年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创《边政》杂志；国民党中宣部创《中东路周刊》。1930年蒙藏委员会创《蒙藏周报》。1931年成立新亚细亚学会，创《新亚细亚》杂志；西北研究会创《西北问题》季刊；开发西北学会创《西陲》杂志。1933年西北论衡社创《西北论衡》月刊；是年顾颉刚等筹建禹贡学会，两年后发行《禹贡》等刊物。1936年边政通讯社创《边政》月刊。北平学术界以西北问题为研究重点，先后有《新蒙古》月刊、《西北研究》、《西北春秋》等发行。1938年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，翌年出版《边疆问题》杂志；国立边疆学校创《边声》月刊等。1939年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成立，翌年发行《边疆研究季刊》；同年中国边疆学会成立，三年后创《中国边疆》月刊。1940年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。1941年金陵大学建中国文化研究所，发行《边疆研究论丛》；延安成立民族学院，招收培养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学生。落址于三台县（成都附近）的东北大学发行《东北知识》月刊和《志林》杂志……仅在陪都重庆就有40多个主要研究边疆民族、与边疆民族相关的团体。影响较大的有四个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、新亚细亚学会、中国边疆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。<sup>⑧</sup>

在研究边疆民族史热潮中，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。主要有傅斯年等：《东北史纲》、顾颉刚和史念海：《中国边疆沿革史》、曾问吾：《中国西域经营史》、卫惠林：《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》、陈廉贞和黄操良：《抗战中的中国民族问题》、夏威：《中国边疆拓展史》、西尊：《边疆问题与国防》、金毓黻：《东北通史》、谢彬：《中国丧地史》、华企云：《中国边疆》、蒋若

璋：《中国边疆史》、童书业：《中国疆域沿革史》……还出版一定数量的边疆民族区地图和考察报告。做出重要贡献的学人除上面提及者外，主要还有张相文、黄文弼、凌纯声、黄奋生、方秋苇、贾拓人等。他们的成就，既反映对统一多民族祖国的情怀，又反映了自己的学术水平。我们党历来尊重真正有学术建树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，并吸取他们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。这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。

边疆民族史研究第二次热潮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：

变无序为有序。民间、半官方的学术团体，高校的研究机构，国民党政府（如蒙藏委员会、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等）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机构……参与其事。虽然是多元组织，但毕竟有组织、有领导，并均可纳入救亡、图存、抗战的总体秩序中，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。同时，按地区或民族，有侧重、有分工、有规划。当是第一次热潮所不及的。

具有较大的广度和深度。建学会、办刊物、多考察、出专著、绘地图、写报告、开讲座、广宣传……从表现形式和人员数量上远远突破第一次热潮的师门、朋友等趣缘结合体。许多专著、文章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，浅显易懂。同时，正如愤怒出好诗一样，苦难中常出好的史学著作，如金毓黻：《东北通史》、顾颉刚和史念海：《中国边疆沿革史》等均有相当的开拓性。

紧紧与社会现实相结合。一些高等院校创办边政系、延安成立民族学院……通过这些教育机构培养许多从事边疆民族工作的专业人才。学者华企云著《满洲问题》、《蒙古问题》等书，有力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满蒙战略阴谋。许多报刊及时报导边疆民族动态。测绘、出版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图……这些工作有助于民众进一步认识国家、熟悉民族、了解边疆、进而启发救亡意识。

带动许多学科的发展。是时，边疆民族史早已突破古代狭小的专业界线，而带有多学科的品格。它的发展，无疑带动许多相关学科，如地理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经济学、外交学、测绘学、军事学等的发展。实际上，促进和带动是相互的，无论谁是主动者，谁是被动者，均无关紧要，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是真实的。

### （三）几点沉思

近代以来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两次热潮，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沉思的事情。有几点应格外提及。

#### 1. 步履艰辛的研究工作及“经世致用”的有限性

边疆民族史研究，兼有基础和应用两种性质。其中，许多应用研究之成果，在当时情况下，没有认真应用。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。

一般言之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，需要纳入政权机构的计划、政策中，需要实权人物的保证，如此方可转化为社会效应。然而多数研究者本身，人微言轻，不能按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“做试验”。从而限制其采纳程度。又第一次热潮时，正值清朝末期；第二次热潮时，恰是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。这些政权均在腐败道路上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滑动。客观言之，已失去调节自身整体病态的机能，再好的研究成果，也常是无心、无力应用之。

当时，连年战争，烽烟滚滚；时局动荡，政策混乱；人们播迁、流亡；财政困乏乃至枯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仅不能充分利用研究成果，就是研究工作本身也受到重重限制。大量学会名存实亡，许多刊物时办时停，某些研究中途夭折。研究工作的步履艰辛，可想而知。

应当承认，历代统治者也不肯轻易放弃每一寸土地。但是当

其政权从根本上受到侵略者的严重威胁时，宁肯出卖边远的土地，也要保住自身的统治地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相应的边疆民族史研究者也就成为统治者心目中的“多余”乃至“障碍”。边疆民族史研究虽旨在救亡图存，保国御敌，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探讨失误，反思时政，警惕世人的内容。这就要常常超出世人的传统看法，冲击守旧势力，甚至刺激统治者狭隘的心胸。于是便遭到现实社会的种种打击。对许多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人才不时“戮其能忧心，能愤心，能思虑心，能作为心”，必置于“心灰神灭”而后快。<sup>⑥</sup>如守旧势力称怀有壮志之巨才的龚自珍为“狂士”、“龚呆子”；清政府对坚决抵抗英国侵略的姚莹一再贬降。多方面因素注定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有限性，束缚有为学人才能的充分发挥。应当说，这既是个人的不幸，又是中华民族的悲剧。有鉴于此，有些人索性走上变法图强乃至民主革命的道路。

## 2. 学科建设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

在边疆危机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，许多士人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投入斗争的旋涡中。虽然没有操戈舞刀，浴血沙场，但凭自身特长而飞笔洒墨，把对祖国的情怀寄托在边疆民族史的研究、宣传上。其论著篇章蕴含着诗人般的激情，字里行间闪动着斗士的身影。依依往事，历历在目。流去的是一去不返的时间，然而却将人生的感悟融汇在事业里。

在资料积累、成果展示、人才培养、学术思想确立等学科总体建设上都取得很大成就。这些成就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：其一，留下许多闪光思想。特别是将中华民族的国土意识、民族意识、边疆意识、主权意识等，经过整理、总结、宣传而不断地升华、普及。“寸寸山河寸寸金”，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，响彻云霄，至今不息，意味着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无不牵连中华民族的神圣情感。实际上，这是用血与火铸造出来的宝贵之

精神财富，它庄重地告诉国人，包括边疆民族史在内的边疆民族学在今后岁月中是不可轻视的，从而为本学科的继续发展提供许多条件，进而奠定某些思想基础。其二，许多研究成果相当踏实，其思路开阔，史料翔实，考辨有力，结论恰当，就是今人也不易超过。还有些研究成果虽非触目惊心，更谈不上什么精品，还可能带有某些错误，致使后继者另觅它径，但总要走上去看一阵子后再继续前进。

综观这两次热潮，边疆民族史研究沿着自身轨道不断地运动着，由古代发展阶段过渡到近代发展阶段，再进入现代发展阶段。据此，这两次热潮是该学科建设上重要的历史时期，她的品格、内涵、外延逐渐趋于阶段性完善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

### 3. 边疆民族史研究者是由多民族构成的

边疆民族史研究两次热潮中，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：从事这项工作的民族构成并非单一汉族，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学人参加，并做出显著成绩。

略早的蒙古族松筠，长期生活在库伦（今蒙古国乌兰巴托）、陕甘和伊犁等地，历任边疆要职，熟悉边陲情况。著有《新疆识略》、《绥服纪略》、《西藏巡边记》等书。满族英和生活在黑龙江地区多年，著作甚丰。其中，《卜魁集》、《部民集》多反映边疆民族文化。满族著名文人西清著《黑龙江外纪》，将“千里疆域之大，收入尺幅之中”。<sup>①</sup>这是研究本地边疆民族的重要参考书。蒙古族学者荣祥主编的地方志巨著《绥远通志》，记载了生活在绥远地区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，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和资料性。1929年班禅驻京办事处创《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月刊》；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创《蒙古旬刊》（蒙汉文）；蒙古留北平学生会创《蒙古》（蒙汉文）；蒙古留日学生会创《祖国》（蒙文）。

1931年青海籍蒙藏学校学生等创《新青海》。1939年回教文化学会成立，发行《回教论坛》杂志；回民救国会成立，发行《回协会刊》。还有前文提及延安成立的民族学院……

从事这些工作的少数民族，与那些民族分裂主义者截然不同。他们从不同层面、不同角度表现出对边疆、对民族、对国家的拳拳之心，融融之情；对侵略者、对压迫者的愤怒。中华各民族儿女在爱国主义旗帜下，共同研究、宣传边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，充分反映他们浓厚的祖国意识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。同时，再次反映一个重要史实：爱国主义精神不是属于中国某个民族和社会某个阶层，而是中华各民族、各阶层共有的整体意识。

#### 4. 爱国主义情怀的突显

参加边疆民族史研究等活动的人，何啻数百数千，他们可能在维护封建统治，或对马克思主义无兴趣，但有个明显的共性，在其忧患意识中，边患频仍，国上危殆，民族苦难，当是重要内容。故而企图从这门学科的研究等活动中总结兴衰经验，索取图强良策，挽救祖国和中华民族危亡。从上述忧患意识中充分反映其爱国主义情怀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的同一种情感。

在“喋血饮恨”中撰写《康辅纪行》<sup>①</sup>的姚莹是为了让同胞了解边疆民族的情况和外国侵略者的行径，以便采取更好的对策。张穆撰写《蒙古游牧记》“志在形势也”，即阐明蒙古地区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等各种“形势”，以备国家缓急之用。何秋涛编写《朔方备乘》之目的，在于“志险要以昭边禁”，“列镇戍以固封疆”，“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。”<sup>②</sup>金毓黻得知“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”，并且日本又肆意歪曲史实，“判断不公”、“别有用意”的情况，而决心研究这个课题，即使在抗战流亡的情况下也未间断，终于写成《东北通史》<sup>③</sup>以正视听，以纠其误。

顾颉刚在1936年1月2日发表的《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计划书》中指出：“强邻肆虐，国亡无日，遂不期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；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，四境首当其冲，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。”<sup>19</sup>顾先生又在《禹贡学会工作计划》中明确表示：“当此国家多难之日，吾辈书生报国有心，而力有未逮。窃顾愿弩钝之资，为救国图存之学。”<sup>20</sup>顾颉刚先生索性将边疆史地学称为“救国图存之学”，这种提法，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地理学家、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主办《地学杂志》，“就最近界约牯陈沿边要害以规战守议”征文，于是该杂志发表大量颇有分量的边疆民族史地论文。如宋教仁：《间岛问题》、白眉初：《边界失地史略》等数十篇。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热爱祖国的情怀。这种情怀足以壮人魂，壮民族魂，壮国家魂。“爱国主义是指导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思想，也是这项事业留给今人，且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应予继承的宝贵遗产。”<sup>21</sup>

## 二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

70年代末，中国学术界迎来“科学的春天”，随之边疆民族史研究进入新阶段。自此至今，美文佳著不胜枚举。许多问题得到开拓，并有了喜人的深度，令人感到欣慰。史学研究与其它工作一样，应该不断、认真地反思，寻找差距。因为反思是自身的调节器和促进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。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，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### （一）继续厘剔谬论

1840年始，资本——帝国主义在用武力侵略中国的过程中，派遣间谍深入边疆民族地区，重金收买民族上层分子，挑拨民族关系，扶植分裂势力。于是边疆民族地区多次发生叛乱、“独立活动”，致

使人片国土沦丧，边界内缩。与此同时，各列强豢养许多学者，他们对中国边疆民族感到特大兴趣，以“探险家”、“旅行团”、“传教士”、“考古学家”等名义纷纷进入中国，踏遍北疆民族地区。其活动纯学术性质甚少，多数旨在收集地理、历史、政治、军事等情报，并掠夺难以数计的珍贵文物和典籍。1860年~1900年间，仅沙俄就“不下数十个”<sup>②</sup>。继之，肆意捏造、歪曲中国边疆民族的历史，混淆视听，与其武装侵略遥相呼应。

日本帝国主义者表现得格外突出。明治维新后，东洋史学兴起。明治四十一年（1904年）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东京支社成立“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”，由著名东洋史家白鸟库吉主持，开展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历史地理之调查，一时成为“满鲜史”研究中心。作为史家，理应无条件服从人类最高正义准则，为探求真理而尽力。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，该组织越来越明目张胆地为侵略出谋划策，掩饰辩护，在东洋史学发展史中写下可耻的篇章。有些论著尽管下些功夫，但却反复表示一些重要观点：“长城以北非中国论”、“满蒙一贯独立论”、“中国南北对抗论”、“日本民族优越论”、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等。这些理论企图说明如下情况：中国北疆民族地区，特别是长城以北的东三省、内外蒙古等大片地区是一贯独立的，不属于中国领土；有史以来，中原与其北部就处于对抗状态；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它所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“圣战”，旨在给这个地区的民族带来福音，与大和民族“共存共荣”。

中国与沙俄的边界线是最长的，外蒙古独立后，也是最长的边界线之一。尽人皆知，沙俄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，用武力不断侵割我国领土，干下无数罪恶勾当。其御用学者米勒等为适应侵略活动的需要，抛出许多谬论，如“满洲、蒙古与中国并列论”、“两江地带无主论”（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无人管辖，

是俄国人“发现”的“新土地”)、“沙俄带来文明论”等。俄国《新时代》杂志公开将中国东北称作“黄俄罗斯”。<sup>46</sup> 酝酿已久的“黄俄罗斯计划”<sup>47</sup>，企图将满洲、蒙古作为黄色公国纳入俄罗斯。拙文特将制造这种谬论的学者称作“黄俄罗斯学派”。后来的“柳条边说”，无疑是这种理论的变种。实际上，沙俄侵略东北和内外蒙古的一系列活动，大体是履践“黄俄罗斯计划”。

随着政治风云变幻，多年来国外某些学者高唱“泛朝鲜主义”的调子。这种调子在纵向方面集中表现为檀君朝鲜——高句丽——渤海——当代朝鲜的主体思想的历史认识体系，并且已将学术争论引向政治斗争乃至领土要求。

在某些情况下，史学家往往充当颇危险的人物。他们使用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的手段，制造宣传假历史、伪学说，输送可怕的“毒液”。一旦被政治野心家利用，便可轻易煽起人们的“狂热”，挑起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战争。在硝烟弥漫和刀光剑影之中，不仅消耗大量的物质财富，践踏蹂躏人们以劳其心力所建立的文明，而且使许多无辜善良的人倒在血泊里。人类历史中，类似情况并非罕见。战争的无情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温馨，憎恨那些政治野心家和为其提供假历史、伪学说之徒。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3500万同胞的在天之灵时时告诫我们：“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”。

中国史学工作者在70年代展开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，建立相应机构，发掘大量史料，写出一些重要论著。对“黄俄罗斯计划”等从多方面予以揭露、剖析。这件事情具有一定意义，提高中国人民对沙俄的认识，有助于苏联等史学走入冷静之中，为我国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第三次热潮提供某些条件。然而其“黄祸”舆论和“殖民意识”等仍不可忽视。

“二战”以后，日本仿照西方民主模式进行改革。受其侵略

的中国、朝鲜、越南和东南亚诸国发生很大变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东洋史学自身进行某些反省、清算，集中批判了“日本民族优越论”等，对昔日的“侵略史学”有所认识。田旗巍等人的论著多以此为宗旨。然而这种反省本来就是有限的，随着日本政治的变化，越来越显得有限、微弱。不久前，日本某些史学家竟然提出臭名昭著的“二十一条要求”是“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利益”、“九一八事变”是日本的“防卫战争”、“大东亚战争”是“解放亚洲的战争”、东京审判是“错误的”等等<sup>⑧</sup>，为“二战”的侵略行径翻案气势汹汹。日本不敢正视历史，何能赢得亚洲人民的信赖！看起来，日本“侵略史学”的阴魂不散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，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复。亚洲各受害国家与其斗争仍然是必要的，长期的。

学术研究中，对不同意见需要宽容、尊重，还应积极吸取各派长处以补充、影响自己。然而沙俄的“黄俄罗斯”理论和日本的“侵略史学”，根本不属于宽容、尊重的内容。我们深知，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，不该让本民族情绪制约学术道德。但是，作为中国学者，同样对心怀叵测的 he 国人，打着科学研究旗号，污蔑我们祖国，损伤中华各民族同胞的言行，不能无动于衷。这正是体现了人类的正义准则。近代边疆民族史反复告诉我们，在这类事物中，任何麻木和迟钝，不仅反映思想观念的落后，而且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厘清上述种种谬论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。仅凭感情解决不了问题，感情不能代替科学。需要继续发掘文献、考古、外文等资料，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，发扬我国史学工作者求实的优良作风。决不是只说几个“不”字就能奏效。粗制滥造，不负责任的做法要严重影响史学界声誉。著书立说不为一时一事，有生命力的史学论著，决不是只向人们展示一次就辄然消失。只有反映真